

• 社会学研究 •

关于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几点讨论

谢立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是一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但人们对这个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理解和运用从名称到内容实际上都包含着不少讹误和不当之处。实际上,“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不是由英格尔斯提出来的;“英格尔斯指标体系”不是一个用来评估“工业时代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英格尔斯指标体系”未形成一个综合评估指数并非一定是个缺陷。

关键词: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工业时代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综合评估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3)03-0056-05

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是一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它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首先在我国出现,流传至今。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它还主要是出现在教科书上。但到了最近这几年,它已经开始被我国部分学者认真地用来对我国和国外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描述和分析,从而使它在更广大的公众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然而,可能为许多人(包括这个指标体系的运用者)所不知道或未意识到的是,人们对这个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理解和运用从名称到内容都包含着不少讹误。本文拟对此略陈一二。

一、“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不是英格尔斯提出的

几乎所有引用或应用“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文献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个指标体系是由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并由他于1983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时介绍给我国学者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之所以叫做“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正是由于它的提出者是英格尔斯。这似乎符合给一项科学发现和发明命名的国际惯例。然而,初步地考证表明,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翻阅我国所有引用或应用“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文献,可以发现这个指标体系的最终来源或文本依据是由王思斌、曹建民、夏学銮、孙立平等人所整理的英格尔斯1983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讲演记录稿。然而,这个讲演稿从头到尾没有一处表明这个所谓的“现代化指标体系”

收稿日期:2003-05-24

作者简介:谢立中(1957—)男,湖南隆回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主要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

是由英格尔斯自己提出来的。相反,英格尔斯却是明确地交代了,他所介绍的这些指标是由一个叫拉西特(B. Russett, 美国著名学者)的人在对比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时提出来的。英格尔斯在讲演中先是介绍了一些西方学者用来描述和理解现代化过程的理论模式,然后提到也有人从经验的、统计的研究角度来看现代化国家的特点,并指出其中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拉西特,他研究了72个国家,有60个特征,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做了研究;另一位只做了不发达国家的研究”,但“两人所得的结果很相近”^[1](P167)。接下来他使用一定的篇幅对拉西特的若干指标(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平均预期寿命等)进行了简略的介绍。这些指标就是后来被我们当作“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主要内容的那些指标。因此,假如真的严格遵循国际惯例,把我国学者现在使用的这个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叫做“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是完全不正确的,而应该叫做“拉西特指标体系”(事实上,拉西特提出的社会指标体系以及拉西特用来陈述这些指标的著作《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手册》一书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影响都很大,被认为是在标题中使用“社会指标”一词的第一本书)^[2](P19)。虽然这个名称已经以讹传讹的方式沿用了到了现在,而且人们似乎也已经习惯了它,但不管怎样,从科学的态度来讲,意识到这个名称包含着一个讹误,还是有必要的。至少有利于我们与国外同行的顺利交流。因为把一些在国外社会科学学者当中许多人皆知首先为拉西特所运用的社会指标说成是“英格尔斯指标”,总是会让那些人摸不清头脑。

二、将“英格尔斯指标体系”看做“工业时代”现代化指标体系时可能产生的问题

最近发表的两份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报告(一份载于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1)》,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另一份则见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002年连续出版、由“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编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都试图对用来描述和分析现代化进程的概念与指标工具进行创新,提出了应该将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在前一份报告中也叫做“传统现代化”^[3],在后一份报告中也叫做“第一次现代化”或“经典现代化”^[4])和信息或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化过程(在后一报告中也叫做“第二次现代化”)加以区分并分别加以描述、评估和分析的看法。他们都认为所谓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是一个只适用于用来描述和分析工业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指标体系,对于信息时代的现代化过程则无法加以应用,需要开发新的评估指标体系。我认为,如果暂不考虑其技术决定论方面的局限,把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现代化区分开来分别加以描述和分析还是有意义的。但把所谓的“英格尔斯指标体系”断定为是一个适于用来对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指标体系却也存在可置疑之处。

我想首先指出存在于上述两份报告其中的一个悖论。人们(包括上述两份报告的作者)通常都将现在所用的这个“英格尔斯指标体系”看做是一个“现代化”实现程度的判定指标体系。除了个别例外(如“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报告),在大多数文献中,这个现代化实现程度的判定指标体系都由11项判定指标组成。它们是:

1.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①;
2. 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5%;
3. 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45%以上;
4. 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在70%以上(或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低于30%);
5. 成人识字率在80%以上;
6. 在校大学生占20—24岁人口比例在10%—15%以上;
7. 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在1000人以下;
8. 婴儿死亡率在3%以下^②;
9. 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10. 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
11.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50%以上。

①“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报告做了适当修正。

②“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报告中没有这项指标。

请注意：在这个被认为是主要用来描述和分析工业时代现代化过程的指标体系当中居然没有反映工业化水平的相关指标（如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工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例、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等）。这样一个指标体系，当人们不对“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现代化”加以区分，笼统地讨论“现代化”时，倒也不会产生什么大的问题（这和上述两份报告所持的观点有所不同。上述两份报告的作者都认为他们所引用的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由于缺乏社会信息化或知识化方面的具体指标而不适于用来描述和分析信息化时代的现代化进程。我对此看法有所保留。我认为，虽然加入某些有关社会信息化方面的具体指标确实能够更好地描述和反映社会信息化方面的进程，但没有这些指标也不会导致重大的困难。因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服务业”主要是由信息或知识生产部门构成的，因而上述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这项指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间接地反映社会信息化或知识化进程的）。可是当人们希望做出这种区分（我前面说过这种区分还是有其价值的）并把它确认为主要是适于用来描述和分析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进程时，问题便会出现。试问一个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16%、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为 30%，而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 54% 的社会（这正是法国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大致情况：1949 年法国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分别为 15.3%、54.1%、30.6%，1967 年的相应数字分别是 8.7%、53.4% 和 37.9%）^{[5] (P128)} 在产业结构方面是否已经完成了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进程？或者一个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尚为 35%、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仅有 65%，但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已达 40% 左右的社会（这也正是德国在 20 世纪初期的大致情况），^{[5] (P161)} 在劳动力结构方面算不算是已经完成了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进程？按照人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英格尔斯现代化判定指标体系”来判定，这两种情况显然都还不能算是实现了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因为其“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和“服务业产值占国民

产总值比例”或者“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这几个用来判断现代化实现程度的基本指标均未达到前述标准）。一个工业产值和工业劳动力比例都已超过了其他各类产业相应比例（其中工业产值比例甚至超过了其他各类产业产值比例之和）的社会还不算是在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方面实现了“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这显然是一个很荒唐的结果。由此可见，这个被认为是适于用来描述和评估工业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指标体系由于没有包含任何反映工业化水平的相关指标而其实并不能恰当地履行自己的功能。

三、英格尔斯介绍的那些社会指标是否真是“工业时代”的指标

上述分析自然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即英格尔斯介绍的那些社会指标是否真是“工业时代”的指标？

事实上，阅读英格尔斯当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讲演记录稿，我们可以发现：

1. 英格尔斯在讲演中所介绍的“拉西特指标”并不止上述 11 个。除了上述指标之外，其实还包括“投资占总产值的比例”、“工业收入占总产值的比例”、“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等。现在人们使用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之所以只包括 11 个指标当是最初的引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英格尔斯的讲演进行归纳后的结果。

2. 虽然英格尔斯在讲演中所介绍的“拉西特指标”并不止上述 11 个，但最初的引用者将其归纳为上述 11 个也并非毫无根据。英格尔斯在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进行对比时确实只明确地提到了 11 个方面的指标和标准，而没有提到反映工业化水平的那些指标和标准。英格尔斯的有关原话是：

“在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典型数字划一条分界线，这条线是任意的，可以选择不同的分界线。一般说，人均年收入 3000 美元；农业生产占总产值的百分比为 12%—15%；服务业的收入占总产值的百分比为 45%。”

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最简单的测量方法是看

非农业劳动力人口百分比……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分界线是非农业劳动力占70%。”

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现代化国家在这方面的分界线：有文化人口80%，受高等教育者占适龄年龄组比例为10%—15%。”

卫生保健方面，“现代化国家的分界线是医生对服务对象为1:1000”。“另一个因素是平均预期寿命。它受婴儿死亡率的影响很大……先进国家分界线，婴儿死亡率为30%；平均预期寿命的分界线为70岁以上。”

人口生态方面，“①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发达国家的分界线为50%。②人口自然增长率……发达国家分界线为1%或以下”。^{[1] (PP170-173)}

但必须注意的是：第一，英格尔斯明确地说他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所划的这条线是“任意的”。因此，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分界线”。第二，英格尔斯把“发达国家”和“现代化国家”两个概念混用，表明他所讲的“现代化”并非仅指我们今天所讲的“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而是不分工业时代和信息（或知识经济）时代、只和“发达”同义的笼统意义上的“现代化”。他所指出的那些标准也不是用来判断“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实现与否的标准，而实际上只是用来判断（按当时的情况看）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标准。由于英格尔斯在做上述讲演时使用的是1970—1979年间各国的数据，此时的“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社会”而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等；可参见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所做的描述），因此英格尔斯所说的“现代化”其实已经不是传统的“工业时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后工业社会”（或“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时代意义上的“现代化”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英格尔斯在比较“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时特别注重“服务业”方面的指标而忽略工业方面指标的一个主要原因。下面这些来自于英格尔斯讲演记录稿的段落可以非常确切地印证我们的这种判断：

“一般假定发达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工业。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发达国家财富大部分来自服务业，来自科学、教育、为其人口提供住房、食物。”^{[1] (P170)}

“西方有人说，现代社会是服务的社会。我的好朋友丹尼尔·贝尔对现代社会论述很多，他同意布莱克教授说现代社会是知识的社会。服务业数字很高，包括许多教授、科学家、实验员、印杂志和编计算机程序的人。服务业是现代社会的关键，而不是工业。”^{[1] (P171)}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英格尔斯在讲演中所介绍的那些指标和标准并不是像前面所提两份“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是一些用来描述和分析“工业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和标准。当我们像英格尔斯以及最初引用这些指标的人那样，不把“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现代化”加以区分，只在发达与否的意义上笼统地使用“现代化”这个词时，将英格尔斯介绍的这些指标及标准当作是用来判断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及标准尚不会引起大的问题。而当我们把“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现代化”明确地加以区分，却将英格尔斯介绍的这些指标及标准看作是用来判定“工业时代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及标准时，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以及一些其他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报告的作者们其实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将英格尔斯介绍的那些指标及标准当作是用来判断“工业时代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及标准时所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他们指出：“用人均GNP达到3000美元作为实现经典现代化的标准，将会产生如下谬误：在1964年以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经典现代化，因为在1964年以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人均GNP达到3000美元。显然，它与历史事实不符。众所周知，在20世纪50—6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工业国家已经实现经典现代化。”^{[4] (P124)}但如果我们意识到英格尔斯在介绍这些指标及标准时心里所想的“现代化”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工业时代的现代化”或“经典现代化”，而是“发达”一词的同义词，那么对英格尔斯为什么会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指标的标准定在3000美元以上，就是好理解的了。

四、英格尔斯介绍的社会指标体系为什么不是一个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英格尔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讲演中所介绍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并不是一个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无论是拉西特还是英格尔斯都没有试图采用一定的统计方法来将这些指标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评估指数。这一点,所有引用或应用英格尔斯那些指标及标准的人都是知道的。不过,在部分学者那里,这被看作是英格尔斯介绍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的一个缺陷。然而,这真的是一个缺陷吗?如果真是一个缺陷的话,英格尔斯或拉西特们为什么不去想法弥补呢?他们为什么不去将这些指标综合成一个单一的评估指数呢?是他们不懂、不会这样做吗?我想,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较大的可能性当是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缺陷,因而不愿去将它们综合成一个单一的评估指数。而他们之所以不愿如此为之的重要原因又多半是他们从西方社会指标运动的经验中意识到,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能发展出一套切实有效的多指标综合评估技术来保证运用这种技术建立起来的那些单一化的综合评估指数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发表于2001年8月2日《光明日报》上的《如何看待社会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估》一文中做了较明确的论述,兹不赘述)。因此,在他们看来,与其把它们综合成一个其合理性和可靠性值得怀疑的单一指数,还不如让它们就以松散的形式存在。实际上,不去建构一个综合性的评估指标体系,除了可以避免它在合理性和可靠性方面所具有的那些缺陷之外,还有一个好

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对那些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城市化人口比重、人均受教育水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从而获得许多更有实际用处和参考价值的信息。

当然,这并不是说英格尔斯或拉西特们所没有做的事我们就不能做。而只是说我们要去尽量理解他们之所以没有这么做的的原因。当我们一定要去做他们没做的这件事情——形成一个单一的现代化综合评估指数(这种综合性的评估指数也确实有其一定的意义或价值)时,我们也一定要充分意识到我们依照目前的技术建立起来的这个综合评估指数也有着重大的局限,它不具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科学性和惟一性。依据它对现代化进程所做的描述和分析不具有客观性。因此,它只能为人们的决策和行动提供一种参考而不是提供一份科学的指南。

参考文献:

- [1] 社会学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1989.
- [2] 伊恩·迈尔斯.人的发展与社会指标[M].贾俊平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
- [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1)[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 [4]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5] 王章辉,黄柯可.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怀 双

Analyses of the So—Called “Inkeles Index System of Modernization”

Xie Lizhong

Abstract The so—called “Inkeles index system of modernization” is a popular index system to evaluate modernization but there ar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and misuses of the system from the name to the content. It show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system is not put forward by Inkeles; it is not an index system to evaluate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industrial age”; it is not necessarily a defect for not forming a composite index of evaluation.

Key words: Inkeles Index System of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in the Industrial Age; Overall Evaluation of Modernization.